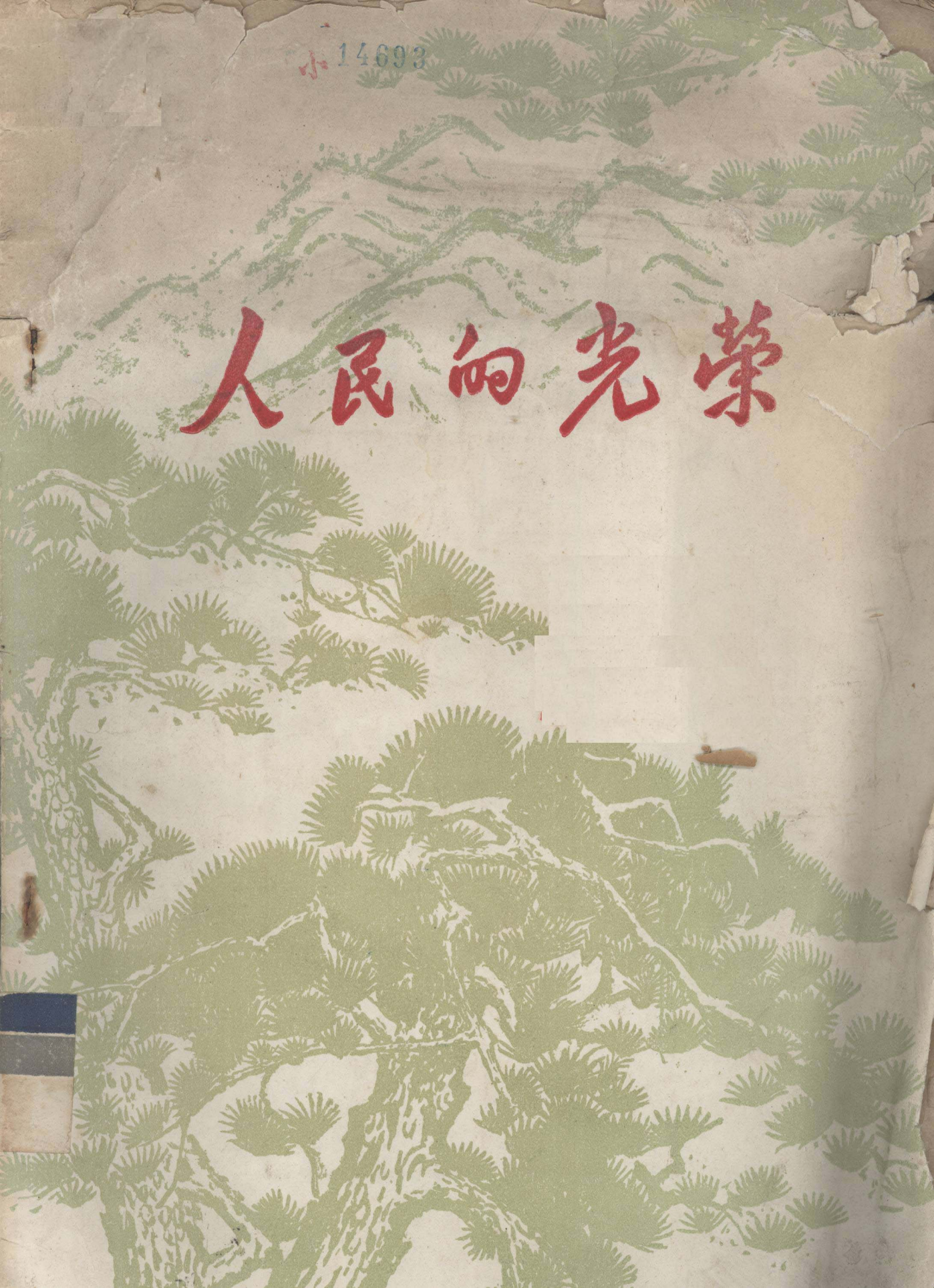


小 14693

人民的光荣



人民的光荣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光辉战斗的一生

广东化工学院图书馆资料组编

一九七七年七月 广州

人 民 的 光 荣

——敬爱的朱德委员长的光辉一生

朱委员长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密战友，他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的一生，是继续革命的一生。在他光辉的九十年中，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从青年时代起，他就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事业，参加了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和蔡松坡将军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云南起义。十月革命后，他象其他老一輩革命家一样，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委员长为创建我国英雄的人民军队，为推翻“三座大山”，创建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我国亿万人民所爱戴。

朱德委员长生前，不断遭到党内外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和诽谤。叛徒、卖国贼林彪无耻篡改井冈山会师的历史，对朱德同志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新老反革命结成的“四人帮”比他们的前輩走的更远，万般贬损、打击朱德同志，连朱德同志写诗歌颂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也被剥夺。在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时候，王、张、江、姚这伙反革命黑帮，出于对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端仇恨和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继疯狂镇压亿万人民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之后，又不准人民哀悼和怀念自己的革命老英雄。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只字不提朱委员长的光辉业绩。他们任意蹂躏人民的感情，践踏人民的意愿，他们以为用几支惯于颠倒黑白的秃笔，下几道法西斯禁令，就可以从亿万人民的心坎上抹掉人民对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限思念，这真是狂犬吠日，蚍蜉撼树。“四人帮”越是反对老一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越是证明他们一伙正是人民的敌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将千秋万代铭记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其他老一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他们是伟大的人民代表，人民永存，历史永续，先烈们永垂不朽！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愿，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今天，缅怀敬爱的朱委员长的伟大的战斗历程，深深感到无产阶级江山来之不易，没有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輩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创业，没有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的前仆后继，流血牺牲，就没有祖国的今天，人民的今天。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老一輩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抓纲治国，为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而英勇奋斗！

一、在动荡与苦难岁月中度过的童年和青年

(1886年——1908年)

1886年11月30日(旧历12月12日)，朱德同志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寨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

朱家原籍广东曲江，明末清初，满清王朝在河南、安徽、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残酷镇压张献忠和白莲教两次农民起义，人民备受摧残，周围地区的贫苦农民，忍受不了当地的封建掠夺，迁移到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朱家的祖先，大约也是这时从曲江北迁，以后在四川定居，到朱德出生时，大约已在四川定居八十年上下，但仍保持着广东的风俗习惯，家中讲客家话和四川话两种方言。

朱德同志的父亲名朱世林，排行第二，母亲姓钟，连个名字也没有。母亲生了十三个儿女，只养活了八个，其他都在贫困中死去了。朱德同志排行第四，最大的姐姐秋香，长兄泰利，二兄泰方。(亦作长兄云阶，次兄继阶，朱德又名玉阶)。朱德同志大约在九岁时过继给伯父朱世年。

朱家是一个有二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当时租种琳琅寨大地主丁三新的七十亩田(一作二十多亩)，丁家有六十多户佃户，外号“阎王”。除租谷外，每年还要为丁家喂养七、八条肥猪。

朱德同志出生的年代，正是祖国苦难深重和大动荡的岁月。望不到尽头的黑暗，笼罩着祖国大地，腐败透顶的满清王朝，招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压迫。当时，鸦片战争过去已将近半个世纪。1864年太平天国天京(南京)被刽子手曾国藩攻陷，革命失败。在朱德同志出生前五年里，帝俄侵占我伊犁河下流大片领土，法国侵占越南，英国侵占缅甸，日本并吞琉球。卖国贼李鸿章在1885年中法战争法国大败的情况下，反而与法国签订割地丧权的

《天津条约》。出现了第一次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从1886年到1908年，在朱德同志整个青少年时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侵略，愈演愈烈，祖国的存亡危在旦夕。1895年中日战争，满清惨败，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第二年，李鸿章又在彼得堡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沙俄又侵占我大片领土，并把魔爪伸入东北全境。法国把两广、云南划为势力范围，德国霸占胶州湾，英国把长江流域划为势力范围，并和帝俄勾结，

“承认”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则在1899年9月6日，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瓜分中国中，“利益均等”，美国应有一份。1900年，义和团在“扶清灭洋”口号下，发动了反帝爱国运动。6月中旬，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7月，俄国十多万侵略军入侵东北。8月中旬，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满清政府再次卖国投降，并在1901年9月7日与侵略国签订《辛丑条约》。

夜长长，路漫漫，“长夜难明赤县天”，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先进的人们，经历千辛万苦，不断寻找救国的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不断鼓吹变法维新的改良主义思想，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变法，任用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变法的内容不过是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和实行有限的民主，也遭到西太后的反对。9月20日，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被杀，康、梁外逃，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戊戌政变）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

与此同时，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也开始了革命活动，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以避免祖国“瓜分豆剖”的危机。1905年7月，孙中山联合黄兴领导的华兴会、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正式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有十七个省的代表参加。11月26日，创办机关报——《民报》，孙中山在“发刊词”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主义，发出民族民主革命的号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同盟会从1895年到辛亥革命，曾多次组织起义，都失败了。

朱德同志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在祖国这样一个苦难和大变动的岁月中度过的。

朱德同志的童年生活极端贫苦，衣不蔽体，连盐巴也很难吃上。琳琅寨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在仪陇县东八十里，有一条古代“驿路”从这里经过到仪陇县城，越过剑阁，通到西安。朱德同志经常蹲在驿路旁的小山上，看世界流转。背着盐巴筐的苦力工人，衣服褴褛，形容憔悴，一队一队从路上经过。还有一些游乡串井的木匠、铁匠、织布匠、织席匠等手艺人，沿着这条路来到琳琅寨卖艺。山区人民靠这些卖艺人做些日用必需品，这些手艺人则带给山区贫苦人民以革命思想。每年冬天来朱家织布的一个老织匠，原来是太平军石达开部的一个士兵，石达开虽然由于搞分裂主义和投降主义，于1863年在四川大渡河败死。但流散在四川的太平军士兵，仍不断宣传太平军的革命业绩和革命主张。朱德同志在童年时期，就从这位太平军战士老织匠口中，知道了不少太平军革命斗争的故事，知道满清王朝极端腐朽残暴。在他年幼的心灵中，播下了对满清封建王朝的仇恨和对革命的向往。

1891年，朱德同志五岁，进入私塾读书，在同学中年纪最小。家中把他送去读书，是梦想将来有朝一日，可以对付税吏和军队的没完没了的勒索。塾中大大小小十六个学生，除朱德同志一人外，都是地主子弟，他们欺负朱德同志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轻蔑地说他是“牵来水牛读经典”。朱德同志狠狠地把这些地主少爷打了一顿，但自己也被赶了出去。

1892年，朱德同志转到地主丁家家塾去读书。丁家勒索学费，百般凌辱，好象让朱德同志到他们家塾读书是莫大的恩典。朱德同志从家中去丁家家塾要走三里路，放学后，还要挑水、放牛，做各种农活。

1895年，朱德同志九岁，丁家地主辞退了朱家租种的田地。朱德同志被迫跟随伯父朱世年迁往离琳琅寨五里的大湾居住。伯父借债把朱德同志送到席聘三（一作席屏安）的私塾中读书。席聘三当时已七十多岁，是一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人，他虽然对科学一无所知，但对科学可以救国却深信不疑，他常说：“到底是采用科学呢，还是趋于灭亡？中国到了抉择的时候了！”这一年中日战争，小小日本由于明治虽新，打败了老大腐朽的满清王朝，更加使席先生相信科学可以救国。1897年，朱德同志十一岁，已为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而忧愁。他的同学吴绍北从成都带回一本数学书，丁字尺，半园仪，席先生和朱德、吴绍北一起经常几小时的研究、学习，朱德同志从此也成了热心科学的人。

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对全国震动很大，但因没触及土地问题，农民兴趣不大。1900年，义和团起义时，川东也有响应。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人打胜这件事激发了中国人向

日本人学习的热情，成百上千人东渡日本留学，四川的开明人士也聘请了日本人来作教师。

1906年秋，朱德同志二十岁，他到仪陇参加了一次科举考试，用的是朱存铭的名字，考上了秀才。接着又借债二百多元作学费，进入顺庆府（今南充市）中等学校读书，教师中有张澜（后任民主同盟主席），当时已入同盟会。学校还聘请日本教师教授日文。朱德同志改名为朱乾德。

1907年3月，朱德同志步行六天，到了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成都，原准备投考军事学校。因家庭反对未果，乃转入高等师范学校，习体育科。学费仍然靠借贷而来。这些债务一直到朱德同志在护国军作旅长时才还清。这时，张澜也来到这间学校作教师，他和其他同盟会员在学校宣传革命主张。朱德同志有时从自己的枕下发现辗转传阅的《民报》，他看完后，又依法传给别人。在革命宣传的影响下，朱德同志这时更加关心国家大事，热望中国变成一个强盛的民主国家。他在这里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和几位同学一起，回到仪陇开办了一间高等小学，朱德同志教授体育兼总务主任。

当时的仪陇是封建豪绅的天下，他们连办学堂这一类的微小改良也不能容忍。朱德同志和其他的教员，被他们诬蔑为“假洋鬼子”。学生上体操课，也被他们视为背叛孔孟之道的洪水猛兽。他们到官府去控告，学校被暂时查封，后来虽然又复学了，但豪绅们又组织流氓暴徒在街头袭击教师和学生。封建势力的压迫，使朱德同志终于不得不离开仪陇。这一段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封建势力总是要扼杀一切新生事物的。在斗争中他的眼界开阔了，办学堂这一类改良办法，并不能挽救国家危亡！他必须摸索另外的革命道路。

二、积极参加辛亥革命和云南起义

（1908年——1920年）

新逃钟死人称快，举出都督是蔡锷。

五华山上树红旗，出师两路援川鄂。

——朱德《辛亥革命杂咏》（四）

只有仁心能救世，西南半壁赖维持。

读书已过五千卷，一创曾当百万师。

——赵尧生《护国战争赠朱总》

英明领袖华主席1976年7月11日，代表中共中央在朱德同志追悼会上所作的悼词中说，朱德同志“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1915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

1908年冬，朱德同志离开仪陇，决定参加当时刚刚建立的“新军”，寻找救国的道路。朱德同志的决心，遭到他全家的激烈反对。他的受封建压迫的苦难深重的家庭，原来希望朱德同志能走“读书做官”的老路，解救家庭的苦难。现在，朱德同志却要去从军，去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大兵！他们为了供给朱德同志读书，负债累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全家都以为他发疯了。离家时，连一个送行的也没有！但是，朱德同志为踏上一个新

的征途，而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和几个好朋友秘密开了一个会，共同发誓：在中国从满清鞑虏统治下解放以前，绝对不求官，不做官！就这样，朱德同志在1908年12月中旬离开了家乡仪陇。从此，到逝世为止，再没有回到过仪陇。

到了成都，朱德同志找到了他的好友秦昆，由秦昆租下了一条木船，第二天他们乘船沿着怒涛澎湃的岷江，顺流而下，经过峰峦多变，怪状奇形的峨眉山，到达宜宾，渡过长江，背着行李，开始向云南的长途跋涉，行走在峭壁悬崖的峡谷中。1909年2月底，朱德同志离开成都十一个星期之后，来到了当时被称之为云南府的昆明。秦昆先考入云南讲武堂，朱德同志几经曲折，又冒籍云南，并得到讲武堂教官罗佩金的批准保荐，才得以进入讲武堂学习。一同入学的有500人。在这时，他正式改名朱德。

当时的云南，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法帝国主义修建的滇越铁路已经修建到昆明，并掠夺了云南七个府的矿产开采权。英帝国主义在侵占缅甸后，又伺机侵吞云南的片马等地。云南人民深切感到“内巩国基，外御强敌”的必要。1907年，在云南的同盟会员创办了《云南杂志》，在创刊词中号召云南人民“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力死不懈，以抗强敌”。在昆明、腾冲都成立了同盟会支部。1908年，孙中山派黄兴到云南边境城镇河口组织起义，又派杨秋帆组织永昌起义，虽然都先后失败了，但在云南人民中震动很大。

云南讲武堂是护理云南总督沈秉坤为了培养清军军官于1909年开办的，同年冬，云贵总督李经羲到昆明上任，把新军十九镇的随营学堂也并入讲武堂。当时讲武堂的总办是李根源，教官中有方声涛、赵康时、李烈钧、罗佩金、唐继尧等人，他们大都是同盟会员，或接受了同盟会的宣传影响。在500多学员中，不少是不满现状的青年，不久，成立了同盟会支部，成为云南革命力量的重要据点。朱德同志进入讲武堂不到几个星期，便参加了同盟会，并成为这个组织最活跃的一员。朱德同志后来对史沫特莱说：“我知道我终于踏上了可以拯救中国于水火的道路，满腹热忱，觉得中国青年实在可以让高山低头，让河水改道”。

在讲武堂学习期间，朱德同志结识了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袁起义中起过重大历史作用的蔡锷将军，并成为亲密的师生和朋友。蔡锷敏锐的思想，冷静稳健的作风，特别是他的自我牺牲的爱国热忱，对朱德同志影响很大。

蔡锷当时二十七岁，长于朱德同志四岁。出身于湖南的一个“书香家庭”，曾留学日本学军事科学。回国先到广西，后到云南，经李根源、罗佩金的推荐，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相当于旅）的协统。蔡锷是一个坚定的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组织保持联系，但不是同盟会员。

朱德同志形容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脸白的文弱书生”。他的协司令部就设在讲武堂内，每晚工作到深夜。在蔡锷的办公室内，堆满了中、日文书籍，其中有孟德斯鸠《法意》一类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著作，有介绍华盛顿、彼得大帝、明治天皇一类的书籍，还有国内外出版的共和派的秘密报刊，宣传武力推翻满清王朝。蔡锷允许朱德同志在办公室阅览这些书籍、报刊，却从不吐露自己的政治见解。但是，在他们之间，逐渐培养出一种毫不显露的共鸣和友谊。

1911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提前毕业，其中包括朱德同志在内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朱德同志被派到七十四标（相当于团，标统罗佩金）第二营左队当排长。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云贵总督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罗佩金也被撤职。10月30日（旧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革命党人在昆明举行起义，当夜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

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新军七十四标在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和李经羲的卫队也参加了起义。朱德同志属蔡锷领导的七十四标，并被指定为连长。

李经羲象做梦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在蔡锷将军的领导下，起义军迎速控制了昆明城门，第二天又攻占了五华山和军械库两个城内敌人最后的据点。活捉总督李经羲，打死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云南督练公所参议靳云鹏逃走。十一月一日，云南军政府宣布成立，公推蔡锷为都督。当时，满清派端方率军入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有很大反革命势力，蔡锷派了两个梯团（旅）八个营援川，朱德同志在援川军中任左队队官（连长），三个星期后占领宜宾，端方、赵尔丰先后被杀。1912年5月，援川军回师昆明，蔡锷晋升朱德同志为少校，并授予“援川”、“复兴”两种勋章。1912年秋，又调朱德同志去讲武堂当教官。这一年朱德和肖竹芬结婚。1916年朱德同志长子出生后不久，肖因病去世。

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当时，包括蔡锷在内的资产阶级革命家还没有认识到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实行土地改革，发动最广大的农民参加革命。只是废除了皇帝，换了一批军、政官员。所以，辛亥革命很快失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掌握了大权。1913年，袁世凯解散议会，准备称帝，并把蔡锷当成一个“危险人物”调到北京，软禁起来。孙中山号召讨袁，李烈钧在湖口起义，黄兴在南京响应，都先后失败。正象吴玉章同志在一首诗中说的：“革命党随革命消，中山无力挽狂潮。拱手让权袁世凯，阴谋窃国祸心包。”资产阶级之软弱性，在辛亥革命中暴露无遗。

1913年，蔡锷将军在离开云南前又调朱德同志到部队工作，不久提升他任团长。朱德所在的第一师，被蔡锷派往云南南部边境，和法帝国主义豢养的土匪作战，朱德同志驻防在蒙自、个旧一带，此后两年，一直在边境保卫国防。

1915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登基”作皇帝的“条件”，12月，卖国贼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称帝复辟。蔡锷将军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在此以前摆脱了袁世凯的监视，取道天津、日本、印度支那回到昆明，凭借他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发动云南护国讨袁起义。蔡锷提任朱德同志为上校，密令他从滇南赶回昆明，率滇军第十团参加护国起义。12月下旬，朱德同志回到昆明见蔡锷，当时蔡锷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命在旦夕，但他思想却锐利的象把宝剑，他向朱德同志说明了起义计划，并说云南必须肩起重担，等待各省共和力量组织起来。蔡锷带病出征，亲率滇军进军川南，他对朱德同志说：“反正我的日子也不长了，我要把全部生命放到民国上。”

护国军发表讨袁宣言，号召打倒袁世凯，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唐继尧逼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蔡锷任护国第一军司令，北出四川；第二军司令李烈钧，出两广。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蔡锷任命朱德同志为第三支队司令。在蔡锷领导下，护国军入川的不过六千人，但军纪严明，战斗力强，和北洋军阀曹琨的“征滇军”十余万人相持于泸州、叙府一带，凭借人民的支持，以少胜多，占领了叙府、泸州。朱德同志是护国之役的先锋部队，泸州蓝田坝一战，使张敬尧落马，吴佩孚、曹琨手足失措，袁世凯胆战心惊。蔡锷把朱德同志擢升为少将旅长，并派老同盟会员孙炳文作他的参议。

护国军在川南的胜利，敲响了袁世凯的丧钟。1916年4月，华南六省声明讨袁，八省拒绝接受命令。1916年6月6日，卖国贼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可耻的死去。北京成立新的军阀政府，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出任“总理”。

蔡锷命朱德同志率领身经百战的第十团进驻泸州。这时，蔡锷病已垂危，他到了成都就任四川督军不到十天，就出国赴日本治疗，1916年11月18日，三十四岁的蔡锷将军在日本逝世。朱德同志对他这位良师益友的评价是：思想敏锐，知识丰富，见解精辟，坚韧无私。

1916年底，四川军阀攻占成都，蔡锷的后任罗佩金逃走。盘据在昆明的唐继尧也成了新军阀，想当“云南王”。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也很快失败。这一年，朱德同志和陈玉贞结婚，陈是四川南溪人，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是朱德同志一位同事的妹妹。后被四川军阀杀害（另据《续西行漫记》：陈1937年仍在）。1918年，护国军改编为靖国军，朱德同志出任靖国军第三混成旅长，进行反对军阀的长期斗争。当时，朱德同志驻防在四川泸州，在这里驻扎五年，不断和听命于北京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军阀作战。就在这时，朱德同志结识了在川军中工作的刘伯承同志。

当时，不论是川军或者是滇军（靖国军）都在不断分化之中，有的成了新的军阀，有的继续坚持革命的道路。朱德同志回顾这个时期的斗争说：“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改变，有的人看到新的道路而不能自拔。刘伯承同志和我两个人则找到和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和四川军阀的连年战争，靖国军损失很大。1919年底，朱德同志的两个弟弟也在和军阀的战争中牺牲。到1920年，一度发展到四万人的靖国军只剩下一半，被迫撤回川南。

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相继失败。朱德同志和一切忠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人们都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之中，在黑暗中摸索而找不到真正的出路。走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朱德同志的面前。

三、寻求革命真理，在柏林结下的战斗友谊

（1921年——1926年）

辛亥革命未成功，领导还须靠劳工。

自从建立共产党，人间才得浴春风。

——吴玉章《革命回忆录序诗》

中山革命未完成，共产党人应运生。

阶段分明仍不断，红旗三面正高擎。

——朱德《辛亥革命杂咏》（八）

华国锋同志在悼词中说，朱德同志“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从1915年12月到1920年底，国际和国内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大事。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还在1916年，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上，号召青年“冲决过去的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十月革命胜利后，毛主席于1918年4月在湖南创建“新民学

会’，开始传播马列主义。1918年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1919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就使中国革命形势为之一变，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下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文化和新思潮，象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国。也给朱德同志这样真心实意寻找救国真理的革命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朱德同志最早接触到新文化、新思潮是送蔡锷将军去日本治病的时候，朱德同志的参议和朋友孙炳文从北京带来《新青年》杂志，并且向朱德同志和垂危的蔡锷讲述这种新思潮的反帝反封建政治内容，命在旦夕的蔡锷仍未失去他敏锐的思想，他低声说：“段祺瑞和袁世凯并无不同之处，他的暗影已经在各地伸张了。”但是蔡锷并没有来得及转变成为一个新式的革命者就与世长辞了。朱德同志后来回顾说：“老的军事斗争的办法不能达到革命的目的，加上十月革命的影响，我深深感到有必要学习俄国的新式革命理论和革命办法，来从头进行革命。”

在反对军阀战争的戎马倥偬中，朱德同志和妻子陈玉贞以及孙炳文等人，在泸州成立了学习小组，探索革命的新途径，他们讨论俄国十月革命，讨论五四运动，讨论民主、科学、民族独立、种族平等的问题，讨论一些杂志如《新青年》、《新潮》中介绍过来的新思潮。他们成了五四运动的热心追随者。1920年，他们听说中国有几个地方组织了工人团体——工会，可是四川还没有；他们又听说，有几个地方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并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可是，他们还看不到马列主义的原著，连一本《共产党宣言》也找不到。不过，他和孙炳文等却为红军打败沙皇军队，打败入侵的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军而深受感动。为什么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而中国革命却一再失败呢？他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革命一定有一个基本的错误。他和陈玉贞、孙炳文就中国的形势以及自己的前途反复研究，订出了几个研究专题，每一项题目都要讨论分析几天之后，才得出结论。他们认为：旧的军事斗争不是他们应走的道路，但在走其他道路之前，应当先研究外国的政治思想与制度。孙炳文决定立刻动身去北京，去见见五四运动的领袖们；朱德同志决定在打倒“云南王”唐继尧后，马上离开军队，去和孙炳文会合。

1921年新年刚过，靖国军突然回师云南，连枪都没放几下，便占领了昆明，控制全省。唐继尧狼狈逃出省外。靖国军的革命声名依然远近皆知，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再度络绎投奔而来，协助把云南变成共和派基地。但，今非昔比，朱德同志对大局的发展，早已持怀疑态度，他向靖国军领导人辞职，宣布要到国外留学，寻找革命真理的计划。同事们再三劝阻，希望他在新政权稳定以前，继续留职，担任云南警察厅长。他暂时同意留下，并作出国的准备。1921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要清除军阀主义，用军事力量统一全国，打破帝国主义用不平等条约压迫中国的桎梏。1922年初，滇军接到孙中山的命令，为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向东进军，留在昆明的只是一些老弱残兵。唐继尧乘虚而来，利用土匪和地主武装，扑向昆明，重新复辟，捕杀革命党人，昆明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朱德同志和罗佩金一起，出昆明西门，准备从楚雄经四川出国。途中，罗佩金被楚雄驻军司令郝凤国出卖被杀。朱德同志经滇北、川西、西康，在哥老会起义者雷允飞的帮助下，5月到了四川南溪家中，在陈玉贞支持下，积极准备到欧洲去寻找革命真理。

1922年6月初，四川新军阀刘湘和杨森邀请朱德同志去重庆。这两个军阀后来在一年内战中，残酷杀害朱德同志的亲属，摧残朱德同志的故乡——仪陇，单是在马鞍场就杀害40多人，还把朱德同志曾祖父、祖父母、伯父的尸骸挖出，撒在粪坑里。悬赏购买朱德同志的首级。但在当时，却幻想把朱德同志留在他们的手下担任一个师长。他们用歌舞盛宴招待朱德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观看龙船会。朱德同志谢绝了他们的邀请和款待，申明他要出国留学的决心。

1922年6月，朱德同志从重庆乘船出三峡，过武汉，沿着波涛汹涌的长江来到了上海。他先在法国医院治疗了一个星期戒烟引起的失眠症。出院后，他深入到里弄和贫民窟里去观察这个十里洋场的真实面貌，在外国人开办的工厂里，手拿皮鞭的工头走来走去，野蛮地抽打着精疲力尽的中国工人，打死人是家常便饭，工人每天要劳动12——14个小时，有时更多。收尸车每天在街上行驶，每年上海要在街头收五、六万具死尸。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劳苦人民的苦难，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好处。上海滩的画面，使朱德同志更坚定了寻找共产主义的决心。

接着，他又到了南京，参观了曾是农民起义领袖的朱元璋的陵墓，然后到了北京，老朋友孙炳文辞去了报馆职务，准备和他一起出国寻找真理。他们了解了北京的政治形势，看清了北洋政府不过是一群掩盖在封建主义浓厚气味下的男盗女娼，争权夺利，时刻准备把中国待价而沽的卖国贼。

他们从北京回到了上海。这时，被陈炯明赶出广东的孙中山也在上海。在法租界孙中山寓所里，由孙炳文介绍，朱德同志会见了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同去的还有一位和朱德同志一起逃出云南的滇军将领金汉鼎。孙中山当时已56岁，已经在革命斗争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虽然不断经受挫折，但对革命前途仍极乐观，他和朱德一样，正在从失败中总结革命的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朱德同志回忆说，孙中山是一位非常谦虚、诚恳的人，对革命充满热忱。他希望朱德、孙炳文利用在滇军的关系，回到当时正在广西的滇军中，协助他驱逐广东的军阀。金汉鼎当场答应了下来，朱德同志和孙炳文拒绝了，他们向孙中山说明了原因：利用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的战术，结果都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这是朱德同志自己从十一年旧式军事活动中得出来的教训。他向孙中山说，中国革命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成了功，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共产主义。他还告诉孙中山，他决定出国留学，在重新接触中国国事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欧洲社会主义运动最强大，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所以准备到欧洲去寻找革命真理。

孙中山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没有偏见，他告诉朱德同志等，他正在重订国民党的新政策——这就是“三大政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和他合作。

三个人又见到国民党另外两个领导人胡汉民和汪精卫。朱德同志后来用极其厌恶、轻蔑的口气回忆说，胡汉民“是个十足的反动派，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看到汪精卫，就使人想到令人作呕的姨太太——戏台上的小丑，顽固封建知识分子的典型”。

下一个见面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朱德同志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认为入了党可以走上真正革命的道路。但是，陈独秀这个混在革命队伍里的假革命，根本看不起这个行伍出身的军人，认为他没有资格革命，还装腔作势地教训他，说什么象朱德这样的人要参加党，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冷冷地拒绝了他。

1922年9月初，朱德同志和孙炳文一起，抱着寻求革命真理的迫切心情，搭上法国轮船“阿尔及利亚”号（一作“安吉尔斯”号），经新加坡、印度、埃及前往法国马赛。一路上，南洋华侨和印度、埃及人民的苦难，使他认识到世界各地的劳苦大众，都是一样的饥寒交迫。到了法国，他们登上巴黎埃弗尔铁塔，俯瞰巴黎的全景。法国是战胜国，但劳动人民生活也很悲惨。在巴黎，他们打听到一批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刚刚成立旅欧中国共产党支部，这批学生的主要组织者，是一位名叫周恩来的人——这就是后来和他的战友回到祖国，在毛主席领导下，同中国人民一起创造中国历史的那位伟大人物。他们在巴黎找不到周恩来，但打听到他在德国柏林的地址，他到德国去建立另外的党支部去了。

柏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时代战斗和生活过的城市，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三年前流血牺牲的地方。也是在这座城市，两位中国人民无限敬爱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会面了，他们在这里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成为终身最亲密的战友。

1922年10月底，朱德同志和孙炳文同志一起从巴黎乘火车到达柏林，他们立即奔向周恩来同志的住处。朱德同志在路上想了很多，将要见面的人会不会亲切接待他们呢？会不会对他们的来历疑虑丛生呢？这一年，朱德同志已三十六岁，在戎马中度过了自己的青春，他多么希望有人把他引导上真正革命的道路啊！

周恩来同志寓所的门打开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位比朱德同志小十二岁的年青人，一双浓眉下，两眼放射出炯炯的光芒。周恩来同志举止沉静，深思熟虑，热情地招呼这两位不速之客就座，谦虚地询问他们有何见教。朱德同志顾不得拉过来的椅子，就端正地用他习惯的军人姿态站在周恩来同志面前，用平稳的声调，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过去，怎样逃出云南，怎样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又怎样为陈独秀所拒绝，现在，为了寻找自己新的生命和中国新的革命道路，而来到欧洲，来到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德国。他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柏林的组织，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一切听从党的调遣，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

朱德同志娓娓道来，周恩来同志就站在他的面前，习惯地侧着头，一直听到说完，才提出问题。

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经历虽然千差万别，但是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十月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念，迫切希望解救祖国人民苦难的伟大抱负，使他们一见如故，他们整整谈了一夜，谈得十分投机。朱德同志对比他小十二岁的周恩来同志非常钦佩；周恩来同志对朱德同志踏破铁鞋，走遍天涯，迫切寻求革命真理，寻找共产党组织的心情非常理解，他立即同意介绍朱德同志和孙炳文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替他们办理了加入柏林党组织的手续，在入党申请书寄回中国而没有批回以前，暂作候补党员。几个月后，党中央回信批准了他们两人为正式党员。从此，朱德同志在政治上开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

半个多世纪中，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生死攸关，休戚与共。他们彼此非常尊重，政治上互相鼓励，工作上互相支持，生活上互相关怀。1927年，他们共同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十年内战中，他们并肩战斗，粉碎蒋介石匪帮一次又一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同志遵照毛主席指示，去西安和国民党谈判。1937年5月，他从朱德同志驻地出发去西安，朱德同志把1931年董振堂同志送给他的一条红色毛毯珍重地转送给周恩来同志，途经甘泉县劳山，遭到国民党匪徒的袭击，周恩来同志机

智勇敢地脱险了，匪徒们气急败坏地砍了这条毛毯十多刀，然后狼狈逃窜。“七七事变”后，朱德同志出发到敌后指挥抗战，周恩来同志为欢送革命老英雄，又把这条经过反围剿、万里长征、劳山遇险的珍贵毛毯回赠给朱德同志。朱德同志带着这条铭刻着战友山高海深革命情谊的毯子，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自卫战争，一直到全国解放，才送到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1937年8月，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一起去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46年11月30日，在延安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寿辰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亲撰祝词，称赞朱德同志的历史功绩。建国以后，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夜以继日，成年很少有休息的机会，但只要有休息的时候，总是要和朱德同志聚在一起。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年已九十的朱德同志听到自己亲密战友的逝世，无法抑制自己的万分悲痛，他从来不掉泪，1974年儿子突然去世，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但此时却老泪纵横。他向总理遗体告别时，一路都在流泪，在车上就要脱掉帽子，在总理遗容前，庄严地举手敬礼！回来后，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当他听到总理遗言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时，严肃地说：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恩格斯去世后的骨灰是撒在大海里，而总理要把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和江河里，这也是一次革命。总理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家。”他一边说，一边流泪，还问女儿：“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的革命历史！”说着，就开始讲述总理革命的一生。女儿怕他过于伤心，没有让他说的太多，但他仍不时自言自语：“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他自己深深陷入对亲密战友的怀念之中。他还没有来得及详细讲述战友的光辉业绩，就在半年后逝世了！

1922年10月，朱德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努力钻研《共产党宣言》和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他在柏林住了一年，完全把精力放在学习马列主义和社会调查上，并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和当地的工人运动。党支部每周举行三次讨论会，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朱德同志也开始用马列主义的观点解剖自己，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他不满足于书本上的知识，还到处调查德国的社会，从博物馆、艺术馆、贝多芬音乐会到德国的工厂、工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都是他调查的对象。在这一年和以后的四年间，他的足迹踏遍德国重要城市和主要工业地区，西到莱茵河畔，南到哈兹和巴伐利亚山区。陪同朱德同志漫游德国的，还有邓演达等人。朱德同志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去分析德国的社会，特别是德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他有一次在卡塞尔住了一个星期，参观了从铸铁到火车头出厂在铁轨上行驶的全过程。德国有先进技术和高度的物质文明，但是工人照样贫穷。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德国，在战争中一败涂地。要中国也步它的后尘，走资本主义的老路，岂非愚蠢之极？他越来越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1923年初，他离开柏林，到哥登根大学政治系，修了两个学期的社会科学。这一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1924年初，朱德同志回到柏林，组织国民党柏林支部，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创办了《政治周报》，和反动的国家社会主义政党——中国青年党进行尖锐的斗争。这时，周恩来同志和朱德同志的老朋友孙炳文都先后回到广州，周恩来同志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炳文任副主任。

当时，希特勒的法西斯活动开始猖獗，德国魏玛共和国日趋反动。朱德同志在柏林的革命活动，受到德国暗探的跟踪。1925年因支持保加利亚革命同志的活动，朱德同志被德国反动警察逮捕，拘禁了二十八个小时。同年6月，在柏林体育宫声援“五卅”运动的会上，又被德国警察逮捕，以“捣乱分子”的罪名，限二十四小时内离境。朱德同志被迫从斯塔丁港乘

船去列宁格勒，取道苏联回国。在回国途中，朱德同志对四年的旅德生活作了总结。他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朱德同志回顾说，“我的新知识的根基，就是恩格斯提出的伟大历史法则，一切政治、宗教、哲学或其他意识形态的斗争，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表现”。“认识了历史发展的法则，结合其他研究和经验，我找到了了解中国过去和现在历史的关键。”他这时是四十岁，但觉得自己的革命事业不过刚刚开始。

四、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和赣、粤、闽、湘艰苦转战

(1926年6月——1928年1月)

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

——朱德《纪念八一》

1926年7月中旬，朱德同志在大革命的高潮中，从欧洲回到了上海，立即投入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这时，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和彭湃同志领导的广东海陆丰农民运动，正在蓬勃的发展。1925年6月，党领导了省（广州）港（香港）工人大罢工，一直坚持了一年两个月。1925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革命工人顾正红和英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上海十多万工人大罢工。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由共产党员叶挺同志率领的独立团，在六月即进军湖南，在湖南农民的帮助下，八月在平江歼灭吴佩孚精锐陆运部，接着又在湖北汀泗桥全歼叶开鑫部，九月五日，即兵临武昌城下。

朱德同志到上海后，党派他到北洋军阀孙传芳驻沪部队中了解军事调动情况。接着，又被派往四川万县川军杨森那里，争取杨森参加国民革命军。7月底，朱德同志从上海出发去四川，八月经武汉到万县，杨森这时首鼠两端，坐观吴佩孚和北伐军的成败。朱德同志向杨森分析了北伐节节胜利的形势，杨森表面上敷衍，暗中仍继续和吴佩孚勾结。10月初，叶挺同志率独立团攻克武汉三镇，吴佩孚狼狈北逃。杨森这时才表示要参加北伐军。1926年秋，朱德同志被党派到杨森部任二十军政治部主任。但，杨森这个军阀对朱德同志戒备很严，仍和吴佩孚相勾结。1926年底，杨森和四川另一个军阀刘湘的反革命面目越来越暴露，杨森并准备逮捕朱德同志和他带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朱德同志被迫离开了万县。在万县时，朱德同志曾和在四川从事革命活动的刘伯承同志见面。1927年3月，刘伯承同志领导的川南暴动，受到刘湘的血腥镇压，被杀几千人，朱德同志的两个侄儿也在暴动中牺牲。

1926年底，朱德同志到了南昌。当时，驻南昌的是朱培德的滇军第五路军（辖第三、第六和第九三个军）。朱德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利用他在护国军时的声望和同僚关系，选定第三军为目标，着手创办军官学校，培养革命武装工作干部，以便从各方面开展革命活动。

朱德同志到南昌后，主持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的工作，任教育团团长，兼任南昌市公安局

长，并一度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同志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工作条件，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六军军长朱培德是朱德同志在护国军中的同僚，第九军军长金汉鼎就是1922年在上海和朱德同志、孙炳文同志一起去见孙中山的那个滇军将领，第三军军长王均是朱德同志在滇军中的间接部下。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在朱德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很快创办起来，名义上隶属第三军，实际上由中共中央军委领导，校址在南昌进贤门花园角的讲武堂内，除朱德同志任团长外，刘介眉同志（后为陈奇涵）任参谋长，南昌市党组织负责人曾天宇同志任教员。

由于朱德同志在辛亥革命和讨袁起义两次战争中的机智勇敢，英勇善战，滇军各部队的进步青年，听到朱德同志创办军官教育团的消息后，都纷纷要求入团学习；江西各地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赶来报考，仅一个多月，到1927年2月中，即接收学员1100多人。全团共编为三个营，第一、二营700多人，学员多是滇军中排以上军官、军佐，他们大多是行伍出身的工农子弟，在滇军中转战数省，受到大革命的影响，倾向革命，内有个别共产党员。思想落后，对革命不满的占极少数。第三营约400人，除了一部分是各地来的青年外，还有一部分是江西军阀李烈钧（原护国军将领）保送的富家子弟，这些人大都想学点本事，作为升官发财之阶，但一般年纪较轻，有一定文化水平，因此不少人经教育后转向进步，走上了革命道路。

开始，有的同志（如参谋长刘介眉）对学员成份复杂，担心不易教育，但朱德同志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对教育改造他们很有信心，朱德同志说：“学员们的思想应该改造，也可以改造。在过去，他们如同在茫茫大海里行驶着的无指针的帆船，没有不会迷失方向的。现在，只要党给他们指明了努力方向，绝大部分甚至全部都是可以培养成为革命的力量。”

教育团根据朱德同志的建议，加强革命政治教育内容，每天从三操两讲改为三操四讲，主要讲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等，朱德同志亲自在纪念周或晚点名时讲话，向学员宣传党的主张和分析革命形势的发展。

朱德同志在教育团生活非常简朴，作风平易近人。他平时穿粗布军服，裹绑腿，穿一双旧皮鞋或草鞋。他的住房只有简单的床铺和一张旧桌子，常因开会或工作忙买个烧饼当一顿饭吃。对下级和学员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学员到他家中，有如亲人一般。他作风民主，从不斥责和处罚学员，在开学之初，他就宣布禁止打骂，以说服教育为主。工作人员和学员可以越级向上提意见，不受任何限制。他特别关心学员政治思想的进步，在纪念周上讲话，常常以自己受人压迫、被人剥削的苦难经历和革命的实践经验教训，来教育学员。并且用一些幽默的言词和通俗的比喻来揭露反革命的阴谋，解释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在笑声里，学员们认识到反革命的丑恶嘴脸，领悟了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深刻的道理。在朱德同志和党组织的教育下，教育团到学期结束时，每个连队都发展到十多个党员，有的党员达全连的三分之一。军官教育团成了南昌革命活动的基地和堡垒。

1927年3月以前，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3月，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上海。但是，就在革命高潮中，反革命已在磨刀霍霍，蠢蠢欲动。3月6日，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遭反动派杀害；3月16日，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国民党市党部被解散，南昌学联、妇女协会等革命团体被反革命AB团捣毁。3月17日，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被国民党反革命分子围攻。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进行血腥的大屠杀，朱德同志的老战友孙炳文同志也在这次屠杀中牺牲了。4月18日，蒋

介石、胡汉民在南京成立了卖国的反动政府。

国内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也反映到军官教育团中来，形势问题、农民问题、政权问题、军队问题、革命与反革命问题等，成为学员议论和辩论的主要问题，朱德同志亲自参加讨论，并引导学员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在4月18日，南京蒋介石反革命政府成立后，全团立即举行声讨大会，朱德同志在会上斩钉截铁地说：“资产阶级已经叛变了革命，我们必须负起责任来，打击这一卑鄙的叛变行为！”

在朱德同志主持下，军官教育团分批到江西参加农民运动，帮助农民镇压反革命地主武装，朱德同志亲自率领一批学员到临川地区开展工作，并留下一批学员在农村坚持工作。朱德同志对出发农村工作的学员说：“我们常讲要发动工农，扶助工农，现在很多县的工农起来了，但运动还不深入。我们派出学员到农村去，就是援助工农的实际行动”。他特别嘱咐学员要注意纪律，不许象旧军队那样糟踏老百姓，“只有老百姓看你们真象革命者，你们的工作才能展开。”这些派到农村去的学员，后来不少成为赣东北和万安暴动的组织者和骨干。

1927年5月17日，夏斗寅发动反革命叛乱；5月21日长沙发生反革命屠杀的“马日事变。”6月下旬，朱培德的反动面目越来越暴露，由滇军上层将领出面，把朱德同志“礼送”出境，朱德同志被迫离开南昌。但二十多天后，朱德同志又在党的指示下，于7月21日秘密回到南昌，他利用滇军中老部下、老关系作掩护，积极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并直接领导军官教育团的起义准备。7月27日，负责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同志也从武汉秘密到达南昌，并住在朱德同志的寓所——南昌花园角二号，稍后，彭湃、恽代英、聂荣臻、林祖涵、吴玉章、徐特立等中央领导同志都到了南昌，刘伯承同志在领导川南暴动失败后，也辗转来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和参加起义的其它领导同志紧张地活动着，教育团这时又成为起义的重要据点之一。

南昌起义，标志着“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我党建立人民武装力量的开始。当时，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有：叶挺同志率领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驻南浔路马回岭车站第四军二十五师；由贺龙同志率领的第二十军，新从鄂东到南昌；南昌城内，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及部分警察武装。卢德明、罗荣桓同志领导的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和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部分学员，正在从武汉来南昌途中。

敌人方面，南昌城内有朱培德所属一个警卫团，第三军两个团和第九军一个团，共约六千人。

临近起义的几天，朱德同志一面领导军官教育团做好准备工作，把枪枝都掌握在党、团员手中，连续打了两次野外，晚上作几次行实战训练。一面又忙于和周恩来同志筹划整个起义的组织工作，和开进南昌系，又要应付滇军的上层工作，以麻痹敌人。在起义战斗打响之前，朱德同志根于三十一日晚将敌第二十三团团长沙于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沙胡子”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邀请”到大士院三十二号伪市长李尚庸住宅。晚上九时以后，埋伏在院外的十多名起义军战士冲进室内，把这三个家伙扣押了起来。这一行动，为顺利消灭敌第二十三团、二十四团创造了条件。

7月31日夜，南昌城头响起了震撼全国的起义枪声，军官教育团在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接应下举行了起义，朱德同志立即被教导队接到起义总指挥部——洗马池江西大旅社。由

于组织严密，在几个小时之内，朱培德留在南昌的部队全部被缴械。起义胜利后，朱德同志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教育团换上了新缴获敌人的崭新武器，编成第九军的基本队，在朱德同志率领下，参加进军广东的南征。

1927年8月5日和6日，南昌起义军三万多人，按照前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全部离开南昌南下广东。8月24日，部队经抚州、宜黄、广昌、石城到达瑞金。前委决定必须先击破会昌之敌，才能向广东进军，并任命朱德同志为前敌总指挥，指挥教育团和二十军一部，向会昌东北之敌进攻。教育团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挑选了二十个战士组成尖兵队，要求他们独立活动，紧紧跟住敌人，敌人一停就打枪，袭击困扰敌人。朱德同志亲自来到指战员中间，做政治鼓动工作，他穿着粗布灰军服，脚穿草鞋，背上草帽，完全是战士装束。他从容不迫，象拉家常一样浅显易懂而又生动地说：“你们不要怕，敌人没有什么了不得。东征时教导团是很勇敢的，打仗时一个团能当几个团，你们要继承东征时教导团的光荣传统。我前边先去看看，你们随后就来。”说完，就先去观察地形。

会昌一战，歼灭了敌人一个多师，起义军绕道闽西长汀、上杭到广东大埔，9月24日，部队到达潮州、汕头。这时，决定由朱德同志率领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大埔县境），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州。这样分兵把口的结果，使得最后向揭阳进军的主力不足六千人，在丰顺汤坑和薛岳等部敌人遭遇，没能击败敌人；黄绍竑部敌军又乘机进攻三河坝朱德同志的部队，切断了二十五师和主力的联系。起义军主力在优势敌人前堵后击，加上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军舰的配合，10月3日在乌石地区遭到敌人的袭击而失败。部分军队突围到海陆丰地区和彭湃同志领导的农民运动会合，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不久也失败。

扼守三河坝的二十五师，在朱德同志的指挥下，和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给敌人以很大的杀伤以后，在10月3日夜间撤出了战斗，会合了从潮汕地区撤出的零散部队，不足两千五百人。一支孤军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是不能停留的，在饶平住了两天之后，部队由当地党组织带路，经大埔、蕉岭，进入福建峰市、武平，又折入江西境内，来到会昌境内筠门岭、天心圩一带。

二十五师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特别是七十三团，它的前身就是在北伐战争中，叶挺同志率领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铁军”独立团。它从1924年建立以后，从没打过败仗，因此也没有打败仗的经验。可是当时，部队连续遭到挫折，到处都是敌人，一支孤军，一无供给，二无援兵，应当怎么办？部队是混乱的，人们的思想也一样混乱。

到天心圩后，朱德同志把排以上的干部集合在河坝子里，和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同志，以及王尔琢同志等干部们中间。朱德同志依然一身灰布军衣，背斗笠，穿草鞋。只是草鞋早已磨破了，胡子长得老长，但两只眼睛还是那样和蔼、慈祥。他走到队伍前，四下看大家坐拢些。

“同志们！好，朱德同志开始讲话了。‘现在有些问题要跟大家讲一讲。’”接着，他把声音严肃地说道：

“大家知道，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同志略略停了一下，眼睛缓缓慢慢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竹林，发出沙沙的响声。朱德同志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前途看清楚。1927年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